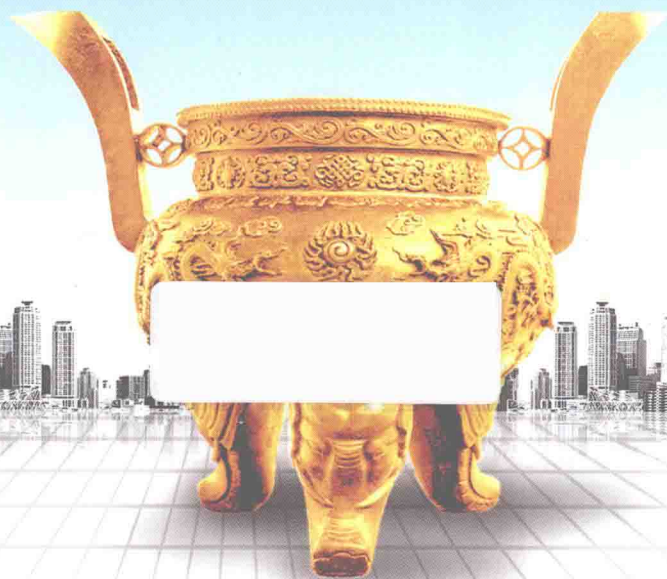


浙商与中国近代银行

宋建江 主编
储建国 程红 编著



杭州出版社

浙商与中国近代银行

宋建江 主编
储建国 程红 编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浙商与中国近代银行 / 宋建江主编 ; 储建国, 程红
编著. — 杭州 : 杭州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65-0170-0

I. ①浙… II. ①宋… ②储… ③程… III. ①商业史
—浙江省—近代②银行史—中国—近代 IV. ①F729
②F83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2433号

浙商与中国近代银行

宋建江 主编 储建国 程 红 编著

责任编辑 杨清华 夏斯斯
美术编辑 王立超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8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5-0170-0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近代浙商创办的银行数量为全国之最。据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以宁波帮诚信、敬业、进取、开拓、创新精神为代表的浙商，在近代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近代银行业等领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据重要历史地位。在近代金融界，涌现出大量担任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的浙籍银行家。如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都是最早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总董。朱葆三还是1912年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银行16个董事之一，后曾任董事长。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二、三任总经理均为浙籍人士：陈笙郊、谢纶辉、傅筱庵，且该行一直由“宁波帮”掌权。李铭为中国银行董事长、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叶揆初为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金润泉为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经理。叶琢堂为中央信托局局长、四明银行总经理、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胡孟嘉曾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盛竹书曾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钱新之为交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次长、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经理。四明银行发起人为李云书、虞洽卿，由周晋龢任总董、陈薰为总经理、虞为协理。其后，孙衡甫、俞佐庭均曾任该行总经理。秦润卿曾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刘鸿生曾任中国企业银行董事长。李咏裳

曾任恒利银行董事长。竺梅先曾任大来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其他小银行不计。

宁波自钱庄形态伊始发展的银行业，倡导的“重然诺”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去弘扬。宁波钱业会馆碑记的第一句话，即为“大信不约”。近代浙商以宁波商帮为代表，他们与银行的关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其共同的特点：

第一，主要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当时的身份不是官僚而是实业家、商人、钱庄老板等；开办资本中少有或完全没有清王朝各级政府投入的官股。

第二，银行的主要资本来源是商业、钱庄业的积累和产业资本。如：浙江兴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浙江铁路公司；四明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宁波籍的商业资本家、钱业资本家。

第三，都注重对工商企业的放款，支持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经营卓有成效，发展较明显。如浙江兴业银行1915年时吸收存款438万元，1926年存款额增加到3312万元；惇叙商业储蓄银行、两浙商业银行等大批银行直至公私合营前歇业。

第五，这些银行有进步和公益的倾向，都曾以一定数额的资金襄助革命。如四明银行和信成银行。《民立报》曾说：“光复前后九月十三四日所发之军饷，大半由该两行输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决定了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金融在服务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又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往往认为金融的发展主要和企业有关，其实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一番就会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和金融

机构发生关系，很难想象，我们离开金融机构还能高质量地发展和生活。即使在偏僻的山村、海岛，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需要良好的金融服务。银行是人们打交道最多的金融机构，从传统意义上讲，银行是人们存钱、取钱的地方，但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各种金融产品的推出，人们的消费、创业、学习、购房、休闲以至于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等都和银行有了直接的联系，步入小康的家庭还需要银行的理财服务等等。近年来，顺应国际上金融业改革的大趋势，我国的金融机构还将从“分业经营”逐步向“混业经营”发展，银行今后为人们服务的范围将会更加广泛。

当然，金融是个风险很大的行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社会稳定的需要，国家把金融风险几乎全包下来了，但随着利率的波动、汇率的变化、通货膨胀的压力、物价上涨的预期以及民间信贷的兴起，人们发现金融风险就在身边。人们开始关注金融形势的变化，普遍感到不学点金融知识就很难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学习金融知识可以从了解金融历史和金融机构入手。银行是人们涉足最多的金融机构，了解一点银行的发展历史对学习金融知识十分必要，了解中国金融的发展历史对我们了解浙江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

近代浙商办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一改历朝多为木版、竖形的旧式纸币，以光绪末年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为典型，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型纸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银行有了快速发展。1912—1927年，全国新设银行186家，平均每年11.6家。浙商办的银行几乎占了一半。其中朱葆三等人上海组织成立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为筹措军费，浙江先后发行过3次军用票。享有纸币发行权而没有正式发行纸币的有中孚银行、上海通和商业银行等；仅见样票的有永亨银行、美华银行、通惠商业银行等；发行过纸币的有永亨银行、大

中银行、中华懋业银行、劝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浙江地方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至国民政府时期，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浙商办的银行停止自行发行纸币，但浙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仍在发行纸币，亦为全国19个抗日革命根据地唯一发行辅币的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银行业快速发展，其金融总量居全国省会城市的前列，浙江的银行机构数量在省会城市中更是首屈一指，而且各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这充分反映了浙江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浙江地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近两年来，外资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又纷纷抢滩浙江，银行数量激增，浙江的银行业欣欣向荣。浙江银行业的前辈们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开拓了早期的银行业，并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有几家早期的银行最后发展成区域性甚至全国性银行，比如目前在香港的浙江兴业银行。从他们的创业和发展历史中，我们可能会有些启示，尽管现在银行业的经营业务和早期银行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在创业精神、诚信尽责、企业文化等方面还是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或引起我们重视之处，也许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有所帮助。在浙江创办和从事金融业，不能不了解历史上的浙江金融业，特别是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过程。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银行同仁们了解浙江银行业的发展历史提供帮助，我们祝愿浙江银行业顺利健康发展。

宋建江

2014年5月26日

凡 例

一、本书收录之近代浙商银行条目，是指自清末至民国时期浙商在-全国各地创办或合办的各类银行，其中包括由当局委任甬籍人士为主职的官办银行。但对董事成员不多、委任主职时间不长的银行从略。

二、本书收录的银行排列，基本上按成立的时间先后为序。有些银行经多次改组易名，有一定的连续性，为叙述起见，对股份性质变化不大的，仍编排在一起；对股份性质变化大、拆散易名的，则另作分目编排。

三、本书所用货币单位，凡“两”均指银两。凡“元”，在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前均指银元，币制改革后均指法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强制推行“中储券”，禁止法币流通，沦陷区此段时间的货币一般指“中储券”。

四、本书收录以旧浙江省籍人士为限。

导 论

浙江人以善于经商著称。早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有谋士就提出过“农末（商）俱利”的思想。越国大夫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从商，成一方首富，人称“陶朱公”，被后世商人尊为始祖。秦汉以来，浙江商人依托省内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不断外出经商，活动区域日益拓展。明中叶后期，浙江商人开始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会馆、会所，形成商帮。在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浙商是龙游商帮。与此同时，宁波帮也开始兴起。进入清代，浙江其他地区的商人外出结帮经商也十分普遍。不过在明清时期，领衔中国商界的是徽商和晋商，浙江商人只是角逐商海的一支重要力量。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经济戴上了沉重的枷锁，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东南五口通商后，地处中国南北海岸线中段、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并逐渐成为全国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浙江商人敢为天下先，敢于吃螃蟹，及时介入新式商业经营。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开始起步，他们创办了上海第一家缫丝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针织厂、第一家肥皂厂、第一家织麻厂、第一家罐头食品厂、第一家毛纺厂、第一家制药厂……据统计，仅宁波帮在工商企业的创设方面就创造了50个第一。不仅如此，浙商在中国近代银行业更令人瞩目。

中国近代出现的银行业，是继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山西票号逐渐式微后在全国新兴的一个金融行业。“银行”一词始于意大利文Banca，原意是商业交易所用的桌椅。英语转化为Bank，原意为存钱的柜子。在中国历史上，货币主要是白银，经商的店铺习惯称“行”，故译为“银行”。在我国南齐（479—502年）时期，就已经出现具有银行性质的质库，时人以库藏钱财供人质借。至唐时，质库多由富豪之家开设，进行押物放款收息。南宋时，除质库外，还出现金银交引铺和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会子局，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当时明州（宁波）城内金银交引铺就有6家。明代，质库演变为典铺（典当），最后成为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行业。清代以降，具有银行雏形的钱铺（钱庄）、票号开始形成，在很长时间内作为金融业的主干。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钱庄记载起源于绍兴商人，风行于江南。晚清时期，绍兴上榜钱庄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重要的影响，成为阻止票号势力（即山西票号）“不得越长江而南者”^①。除了绍兴钱庄外，宁波的钱庄也十分发达。19世纪30年代，宁波小小的江夏街就聚集着大大小小的钱庄150余家，有着“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夏”之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上海九大钱庄家族集团中，浙籍商人占了6家。除此之外，杭州、湖州南浔等地的钱庄也比较发达。杭州的钱庄在1914年有开泰、广大裕、恒盛等14家钱庄。到1932年，杭州有大同行钱庄27家，资本共有58.8万元，小同行钱庄23家，资本共有22万元。南浔的“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民谣，以“象”“牛”“狗”的身躯大小象征财富的多寡（财产达100万以上者称为“象”，50万至100万者，称为“牛”，20万以上至50万者，称为“狗”）。如被称为“四象”之一的刘墉，在上海和湖州等地

^①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民国丛书》（第4编），上海书店1984年版。

曾开设典当铺达29家。

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大举进入中国，中国旧有的金融制度遭到严峻的挑战。银行作为当时金融业的新生事物，以其资力雄厚、功能强大、制度严格、业务庞大等不同于旧式金融组织的各种优越性凸显。敏锐的浙商意识到旧式的典当、钱庄、银号将因其自身多方面的限制，无法满足新兴起的现代大工业机器生产及交通运输发展对大量资金的需求，最终要被银行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对新兴事物素来极为敏感的浙商开始积极投身其中，主动向近代银行业转化和渗透。在民族金融业实现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过程中，浙商引领潮流，成功促使了旧式金融向近代金融的转变。

1897年，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浙籍商人严信厚就自愿要求将所设票号和各埠分支店铺改组加入，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组织管理制度下，通商银行创办初期执掌权柄的9个总董中，浙籍人士就占了5名，并先后有多人担任常务理事，该行的前三任经理及第二任董事长均为浙籍人士。1906年，宁波商人虞洽卿等12人倡议创办了四明银行，并于1908年在上海设立，这是由宁波人独资创办的我国近代第一批商业银行之一。另外，浙商还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及全国唯一的女子银行“坤范银行”等。至20世纪30年代，国内著名银行的总行有80%以上设立在上海，浙籍商人参与投资、创办、管理的几乎涉及上海所有的重要银行，成为“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之匹敌者”^①。

显而易见，浙商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研究“浙商与近代银行”这个专题的人并不多见。

① 毛祖棠：《百年浙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正如研究浙商一样，山西对晋商的研究由来已久。他们在孔祥毅教授的发起下，从1960年就开始“晋商与票号”的研究，64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过。现在山西财经大学还设有“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这一机构。而晋商与票号的偃息，正是浙商与银行崛起之时。山西人正在总结晋商的票号衰落后被浙商的银行业所替代这一历史教训。据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冈元司《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一文透露，不久前日本方面投入11亿日元（约7000万元人民币），联合日本多所大学，以中国宁波为基点进行多项目研究，其中代号为“B01—02”的课题，就是研究近代宁波包括浙江地域金融、货币对东亚的影响^①，其中包含研究近代浙商所办的银行对东亚的影响。

本书通过研究浙商与近代银行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总结浙商在近代银行业中的经验与教训，发掘浙商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气质，扩大提升浙商的知名度，推进浙江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以论为主，分章论述浙商在推动宏观环境建设、形成独特的经营管理风格、造就一批杰出的金融人才等方面为中国近代银行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下篇立足史料和丰富的钱币藏品，从两个维度分别列述浙商与中国近代银行的关系：一是以时间为经，分别罗列浙商参股的官商合办银行、浙商投资组建的商业银行、浙商参与经营的中国近代银行；二是以人名为纬，列举浙籍银行界知名人士生平履历，以期勾勒浙商与中国近代银行之间的关系图景，凸显浙商精神。

① 《宁波日报》，2005年12月11日。

目 录

凡 例	1
导 论	2
上篇 浙商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贡献	1
第一章 推动宏观金融环境的建设	3
第一节 积极参与统一币制改革	3
第二节 抵制停兑令, 维持金融稳定	8
第三节 组建上海银行公会	11
第四节 着力完善信用制度	18
第二章 形成独特的经营管理风格	24
第一节 注重制度管理	24
第二节 鼓励业务创新	29
第三节 坚持稳健发展	34
第四节 主张抱团经营	37
第三章 造就一批杰出的金融人才	45

下篇 中国近代银行和浙籍银行家	57
第四章 浙商参股的官商合办银行	59
第五章 浙商投资组建的商业银行	79
第六章 浙商参与经营的中国近代银行	217
第七章 浙籍近代银行家传略	247
参考文献	299
后 记	302

上篇

浙商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贡献

浙籍银行家是在金融制度非常薄弱的环境中开始从事自己的事业的。他们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经营各类银行，并着手组建银行，在建立健全金融制度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积极推动金融制度创新，完成了许多本来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金融制度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并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近代金融人才，这与浙籍银行家长期努力与奋斗是分不开的。

第一章 推动宏观金融环境的建设

近代金融发展史即是一部金融创新史，甚至可以说是金融创建史。浙商在组建银行，发展银行业务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试错，不断从实践中创新，为旧式金融体制的转型，推动当时中国的宏观金融环境建设，创建中国金融制度作出了筚路蓝缕之功。

第一节 积极参与统一币制改革

近代以来，中国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不统一，货币种类繁多，货币制度混乱。“30年代初，有案可查的银两有110种。”^①1931年，在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银币总数有1707225千元^②。因而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③。这不仅给银行业的经营造成许多不便和局限，更使本就衰弱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成为民族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巨大障碍。

浙籍银行家们对于币制改革提出了许多意见。徐寄庠提出了改革币制混乱状况的三条办法：“（1）由财政部令造币厂逐月改铸也。（2）由中交二行陆续收回改铸也。（3）由华商银行及各钱庄自由向造币厂

① 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② 《银行周报》第16卷第2号，1933年1月26日。

③ 杨格著，陈泽宪等译：《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